

扬州学派
人物评传

赵昌智 主编



扬州学派丛书 赵昌智 主编

YangzhouXuepaiCongshu-RenWuPingZh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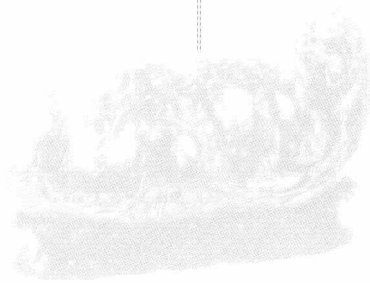
扬州学派
人物评传

赵昌智 主编

扬州学派丛书

赵昌智 主编

广陵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扬州学派人物评传 / 赵昌智主编. —扬州: 广陵书社,
2007.7

(扬州学派丛书 / 赵昌智主编)

ISBN 978-7-80694-203-1

I. 扬… II. 赵… III. 思想家—评传—扬州市—清代
IV. B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7648 号

书 名 扬州学派人物评传

主 编 赵昌智

责任编辑 刘 栋 殷 伟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文昌西路双博馆附二楼 邮编 225012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yzglss@163.com

印 刷 扬州市机关彩印中心

扬州市府西路 8 号 邮编 225009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6.875

字 数 407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94-203-1/K·87

定 价 35.00 元

广陵书社版图书如印装错误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扬州学派丛书序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学术史上，清代学术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云：“在我国，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有清二百六十八年，主流学术是以经学为核心的朴学。扬州学派，则是清代学术史上最重要的朴学流派之一。

在《清史稿》和《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扬州学派朴学家得以立传者有汪中、汪喜孙、王念孙、王引之、任大椿、江藩、阮元、焦循、朱彬、刘台拱、刘宝楠、刘恭冕、凌曙、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等三十余人。如果把该学派扬州籍先驱者和异地成员计算在内，则远不止此数。在清代学术诸流派中，群星璀璨臻于此境者，殊为罕见。

十八世纪扬州学派之兴盛，实非偶然。除了清代中叶全国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快、学术趋于繁荣这个大背景之外，与扬州区域经济、文化的特定条件亦密不可分。

在清代，扬州是全国最具有经济活力的区域之一。徐谦芳《扬州风土记略》说：“扬州地势平衍，民性纯善，四野之民业农，四郊之民业圃，沿江各洲之民业商，傍海之民业渔盐，自昔以富庶称者以此。”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勤劳、智慧的扬州人民创造

了异常丰厚的物质财富。清代扬州的支柱产业，一是盐业，一是运输业。在乾隆年间，仅“淮盐正课”一项上缴国家的银两即达四百万两之多。所以，当时人曾经感叹：“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两淮盐法志》）而运输业，据《钦定户部漕运全书》记载，自顺治年间开始，通过扬州转输的漕粮多达三百二十万石左右，约占全国漕运量的八成。盐运，在全国也占有举足轻重的份额。发达的区域经济，是扬州文化事业发展的保障。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记载：“两淮盐利甲天下，书院膏火资焉。故扬州之书院，与江宁省会相颉颃，其著名者有安定、梅花、广陵三书院，省内外人士咸得肄业。”当然，区域经济对文化事业的支撑，绝非只此一端。

扬州还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其学术渊源之深远为世所公认。西汉董仲舒曾任江都相，其思想在当时和后世产生重大影响，亦开创扬州一地之学风。隋唐扬州籍学者曹宪、李善研究《文选》，形成了名震京师、影响及于全国的“文选学”。南唐广陵人徐铉、徐锴兄弟校正《说文解字》，援引精博，小学家罕能及之，被学界称为“大小徐”。宋代海陵人胡瑗精通经学，开理学之先声，并以富有新意的“苏湖教法”显著地影响了全国的文化教育。安定书院之命名，寓有纪念和继承这位先贤的美意。

正是因为拥有这样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扬州学派才可能在清代跃然问世。

扬州学派在许多方面都有卓越成就。传统的经学研究，以清代为总结阶段。阮元主持编纂的《皇清经解》、《经籍纂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对于综理经学文献，推动朴学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中华书局精选清人十三经注疏二十四种，其中扬州学派的著作有六种，占四分之一。这不妨作为评估扬州学派经学成就的一项指

标。传统小学，以清代为高峰。戴震、段玉裁、高邮二王为其杰出代表。尤以高邮二王在诂释古代虚字等方面的成果与方法，影响深广，即便在现代也被学者奉为圭臬。诸子学在乾嘉以后走向复兴。汪中研究《墨子》、《老子》、《荀子》及贾谊《新书》，见识卓尔不群，开风气之先。扬州学派在文学、史学、地理学、数学、金石学等方面的实绩也斐然可观。王国维通观有清一代学术，尝谓清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晚清之学新。证之扬州朴学家之事实，这是不刊之言。

独特的学术环境和学术渊源，赋予扬州学派鲜明的学术特征，概而言之，就是张舜徽先生所说的“通”字。这种“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讲究训诂考据与义理的贯通。扬州学派学者把考据训诂视为治学的根柢、通经的桥梁，他们反对臆说，使用朴学的方法，对古书旧义作有条不紊的组织，实现文字训释的融会贯通，对经籍的诠释作出巨大贡献。二是坚持“道”与“艺”兼重。扬州学者求为“通儒”，其重大成就和突出长处，在于不仅致力于发明古经之本义，还大力发明和发扬早期儒家重视实用之学的传统。阮元轻看“世之习课条而无学术，守章句而无经世之具者”，推崇顾炎武以“经史”之学统“经济”之学。汪中之为学，视野开阔，经学、文学之外，兼擅史学、文献学、舆地学；焦循著《加減乘除释》等数学著作、《李翁医记》等医学著作、《北湖小志》等史地类著作、《花部农谭》等文艺类著作；阮元著《畴人传》，系统记载天文算法方面的科技人物和创造发明，都具有自觉的致用意识。三是重视“日新”，反对“据守”。为时代变化所感，扬州学派学者多具有注重发展变化的理念。焦循无论是阐明性理、讨论经学，还是教诫弟子，都经常强调事物之变化不居、前进不止。他独对古人之说不轻信盲从，对当时学术界以考据、汉学、宋学相标

榜的习气，也予以尖锐批评。

自清末以来，学术界对扬州学派的研究未曾中断。有学者统计，自1900年至1993年，已刊的扬州学派研究论著多达四百余篇（部）。最近十年，扬州学派研究愈加活跃。海内外都有高校和研究机构立项研究扬州学派，海峡两岸多次开展学术交流，举办专题学术研讨会。扬州市和扬州大学的专家学者还发起成立了扬州学派研究会。我们认为，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深入研究扬州学派的积极意义愈加彰显。其一，研究扬州学派求真务实、通经致用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其在促进中国学术风气转变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有助于正确认识扬州学派应有的学术地位，完整把握中国学术发展的历史进程。其二，扬州学派学术成果众多，但是利用远远不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少文献藏之深闺，世所罕见，深入发掘、研究扬州学派文献，无疑有益于促进学术事业的繁荣。其三，扬州学派学风优良，笃志博学，躬行实践，求同存异，不事张扬，展开对扬州学派的深入研究和普及宣传，有助于矫正今日学坛浮躁之气，对学人为学，乃至对政要为官和普通百姓为人，不无启迪。其四，海内外学界对扬州学派研究具有很高的热情，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共同做好扬州学派研究这篇大文章，有助于促进学术交流，扩大城市影响，提升城市形象。

目前，扬州学派文献整理与出版工作虽已取得可观的成绩，已经刊行的扬州学派代表性论著有数十种，这是开展研究的良好基础。但是依然存在诸多不足：扬州学派不少文献绝版已久，稿本、抄本未经刊行者尚多。已经出版的文献，以收入大型丛书影印出版者居多，学者购藏、利用均有不便。经过整理的文献，还存在校点不密等缺陷。总之，扬州学派文献的整理与出版，离系统、完善的目标，犹属任重道远。这种状况，势必制约扬州学派研究的推进，

对于扩大扬州学派学术的传播尤为不利。

有鉴于此，我们筹划整理、出版《扬州学派丛书》。本丛书包含清代扬州学术名家的文集、扬州学派代表人物评传和扬州学派研究论著三大部分。其中，学术名家文集初步拟订书目如下：王懋竑集、朱泽沅集、陈厚耀集、新编汪中集、王念孙集、王引之集、任大椿集、刘台拱集、江藩集、阮元集、焦循集、凌廷堪集、黄承吉集、凌曙集、陈奂集、刘文淇集、刘宝楠集、汪喜孙集、陈立集、柳兴恩集、朱彬集、刘恭冕集、成蓉镜集、刘毓崧集、刘寿曾集、刘师培集。在上述各家中，王懋竑、朱泽沅等人不是“隆汉贬宋”规范意义上的朴学家，但是，他们作为扬州学者，在学行与学风方面都是本地后学之楷模，因此不拘汉宋而收录其文集。凌廷堪、陈奂、陈立、柳兴恩虽非扬州籍学者，与扬州学派诸大师却存在学统相承的关系，因此不拘籍贯而收录其文集。其人物评传亦拟同此。研究论著则以新成果为主。这样确定书目，其利弊得失如何，欢迎学界同道讨论、赐教。为节用人力、物力，对上述各家文集，已有辑录较为完备、校点较为精当的文本问世的，暂以存目方式处理。

应邀参加《扬州学派丛书》整理、编著工作的群体，主要由扬州大学和扬州市的专业人员组成。其中有德高望重、学养深厚的老一辈专家，也有基础扎实、勤奋好学的中青年学者。系统地搜集、整理扬州学派文献，并与海内外同道协力推进扬州学派研究，这是大家共同的心愿。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过程，也就是创造灿烂的当代文化的过程。我们深信，在整理研究扬州学派文献的实践中，认真总结、吸取前人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掘、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必将有力地促进当代扬州学者群体发展壮大和学术事业欣欣向荣。

历史正在向前发展。今天的扬州，正处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设加速期。扬州地区经济建设的进步，为扬州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日趋优越的条件。包括学术文化在内的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对扬州社会的文明进步也起到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扬州是饮誉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让扬州的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无论是从文化层面还是从经济层面看，扬州的传统文化都是建设新时代文化名城的重要资源。因此，整理扬州学派文献，研究扬州学派，钻研的虽是古书，从事的却是面向现实和未来的全新事业。

赵昌智 田汉云

二〇〇五年三月二日

前 言

——扬州学派述略

赵昌智

清代学术以乾嘉学派为其标识，乾嘉学派代表了清代的最高学术成就。乾嘉学派主要由吴、皖、扬三大流派构成。张舜徽先生说：“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这应该说是不刊之论。

对清代学术史的分期，前贤早有明断，即分为三期，清初为一期，乾嘉为一期，道咸以降为一期。如王国维言“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其特点“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稍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分析“清代思潮”，

断清初为启蒙期，清中叶为全盛期，晚清为蜕分期及衰落期。梁启超论清学之演进脉络，王国维论清学三期之特色，都是深湛之识，故为后之学者所遵信。

明清之际，社会动荡。广大士子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反思，顾炎武首倡“理学即经学”，锋芒直指明代空疏学风，阎若璩、胡渭等纷起响应，形成思潮。“然草创未精博，时糅杂宋明谰言”（章炳麟《诂书·清儒》）。乾隆年间，惠栋（1697~1758）明确打出汉学旗帜，他提出：“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师友，如沈彤、余萧客、江声、王鸣盛、钱大昕等。他们的学术宗旨、治学内容、治学风格大体相近，形成了一个学术阵营，后之学者称之为“吴学”或“吴派”，“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的古，其短亦在于泥古”。继吴派而起者，为以休宁戴震（1724~1777）为宗师的“皖派”。这一派以求是为标志，坚持由字以通辞，由辞以明道，倡导考据与义理的结合。凌廷堪《戴东原先生事略状》云：“先生之学，无所不通，而其所由至道者则有三：曰小学，曰测算，曰典章制度。……至于《原善》三篇，《孟子字义疏证》三卷……由故训而明理义者，盖先生至道之书也。”汪中则更高度评价说：“国朝诸儒崛起，接两千余年沉沦之绪……亭林（顾炎武）始开其端……及东原（戴震）出而集大成焉。”

受吴、皖两派影响，特别是受戴震影响，扬州学派继之而起。吴派的影响主要来自惠栋。惠栋曾在两淮都转盐运使卢见曾幕中，与扬州学人交往较多。江声、余萧客为惠栋弟子，而江藩又从江、余学，为惠栋的再传弟子。江藩从江声学而通七经三史及《说文解字》，余萧客更视江藩为衣钵传人。皖派的影响更大，戴震在乾隆

二十年（1755）到京师时，结识一时名流，次年被王安国延为西席，王念孙从之学。二十二年（1757），戴震游扬州，经卢见曾介绍与惠栋订交，其时惠栋年逾花甲，戴震方35岁，这是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无疑对扬州的学术研究推动是大的。第二年惠栋病逝。今天虽然无法确知两人见面时的详细情况，但从乾隆三十年戴震撰《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来看，两人在经学研究上所谈甚深甚透，因戴震决心继续惠栋生前的《礼记》研究，借鉴惠栋的讲经方法，终于写成《七经小记》。戴震在扬州住了约四年，著有《大戴礼记目录后语》、《金山志》等，且用力于《大戴礼记》的校勘。三十八年（1773）《四库全书》开馆，刘台拱与戴震为同事，交往甚密。任大椿与戴震为“同志之友而问学焉”。凌廷堪私淑戴震。可见戴震对扬州学人影响很大。所以，徐复先生在《扬州学派新论序》中引述了章太炎的话：“震又教于京师，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皆从问业。弟子最知名者：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接着指出：“任大椿、王念孙皆扬州人，任传戴氏典章制度，王传声音训诂，皆有盛名于时。既而凌廷堪以歙人居扬州，与焦循友善，阮元问教于二人，遂别创扬州学派，声誉因以崛起。此后浙江诂经精舍、广东学海堂诸彦，大都不惑于陈言，以知新为主，树阮氏为标帜焉。”这里说明了三点：一是扬州学派是在“传”的基础上“创”；二是扬州学派的真正确立是在阮元、焦循、凌廷堪的时候，阮元为标帜；三是扬州学派并非一地之学，而是全国之学。

对清代学术史上是否存在一个扬州学派，或者是否有必要分列一个扬州学派，从方东树《汉学商兑》发表以来，一直有分歧。方氏是从抨击角度首次提出这个概念的。这可能反而提醒了人们认真审视乾嘉时期扬州学人是否构成一个学派。梁启超，特别是近人张舜徽先生，都是充分肯定扬州学派的。通过扬州大学祁龙威先生发

起而开展的扬州学派研究，经过海峡两岸学者的互访和研讨，应该说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尤以王俊义先生《关于扬州学派的几个问题》、田汉云先生《关于进一步确认扬州学派的思考》等文章叙述最为透彻明了。王俊义说：“我总的认为扬州学派是以扬州地域为中心，以王念孙、汪中、焦循和阮元等为主要代表人物，作为乾嘉汉学的分支，活动于清代乾嘉道时期的一个学术流派。它既反映了乾嘉汉学的鼎盛，也反映了汉学走向没落之际，新的学术思潮即将兴起的某些先兆，是清代特定历史阶段的学术流派。”田汉云则从学派基本理论研究入手，以学派确认之基本标准与扬学之具备程度为主要视角，作了具体分析。他指出，拥有一个学术群体，是判断一个学派存在的最外在、最基本的标准之一。以《清史稿》与《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的记载为依据，扬州籍著名学者有陈厚耀、王懋竑、乔灌、朱泽沄、刘台拱、王念孙、王引之、汪中及其子汪喜孙、贾田祖、顾九苞、顾凤毛、任大椿、任兆麟、阮元及其子阮福、焦循及其子焦廷琥、江藩、钟怀、朱彬、刘宝楠及其子刘恭冕、凌曙、方申、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梅毓、成孺、罗士琳、黄承吉、宋绵初、汪德奎、徐复、汪光燾等。还有凌廷堪，虽非扬州籍，但长期生活在扬州，学术活动也主要在扬州，又入赘扬州，也应算作扬州学人。《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为 370 余人作传，其中扬州地区的名家约占百分之八。清代雍正以后扬州府治领二州（高邮、泰州）、六县（江都、甘泉、仪征、兴化、宝应、东台），地域不大，而学人所占比例是高的。学者学术活跃时间分布多集中于 18 世纪中期到 19 世纪中期。乾隆时为王念孙、汪中、刘台拱、任大椿及李惇、贾田祖、朱彬等；嘉庆时为凌廷堪、焦循、阮元、江藩、王引之及凌曙、黄承吉、钟怀、汪光燾、李钟泗、宋绵初、秦恩复等；道光时为刘文淇、刘宝楠、汪喜孙等，成蓉镜、刘恭

冕、刘毓崧等就更迟了。乾嘉道是扬学昌盛阶段。扬州学者不仅人数多，而且具有学术群体意识，在传承吴、皖学派的基础上，“通”与“创”的学术特征也比较明显。所以，应当把扬州学派视为继之而起的一种学术流派。

当然，学术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为了研究的方便，进行一些归纳分析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但如果硬要绝对化就错了。比如长江大河，奔腾浩荡，在不同的地段有不同的特征，我们可以给某段起某名，堤岸可以分，流水如何分呢？反过来，分段研究见其细部，可以更好地把握整个流域情况。所以，对学术流派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将研究引向深入，力求准确地揭示历史的本质，而不是别的。祁龙威先生曾说过：“吴、皖、扬三派的划分，显示乾嘉经学连续发展的三个阶段，这是学术内在的脉络。”既点明“三派”，又点明“三个阶段”，确乎真知卓识。

二

扬州学派以其研究内容的博大精深而光大清学。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扬州一派”“他们研究的范围比较广博”。不仅在经学研究方面成就卓著，而且在史学、文学、文字学、地理学以及天文历算等方面也都有重要贡献。

扬州学派所研究的重点是经学。其重要成果，关于《诗经》的有：焦循的《毛诗补疏》、《陆氏〈草木鸟兽虫鱼疏〉疏》，阮元的《三家诗补遗》等；关于《尚书》的有：焦循的《尚书补疏》、刘毓崧的《尚书旧疏考证》，成孺的《禹贡班义述》、《尚书历谱》等；关于“三礼”的有：阮元的《仪礼石经校勘记》，焦循的《礼记补

疏》、《群经宫室图》，任大椿的《弁服释例》，刘寿曾的《昏礼重别论对驳义》，汪喜孙的《丧服答问纪实》，朱彬的《礼记训纂》，凌曙的《礼说》等；关于《周易》的有：焦循的《易学三书》（《易章句》、《易通释》、《易图略》），江藩的《周易述补》，刘毓崧的《周易旧疏考证》等；关于《春秋》的有：汪中的《春秋述义》，焦循的《春秋左传补疏》，刘文淇的《春秋左传旧疏考证》、《春秋左传旧注疏证》，刘毓崧、刘寿曾续修《春秋左传旧注疏证》等；关于“四书”的有：焦循的《论语补疏》、《孟子正义》，阮元的《论语论仁论》、《孟子论仁论》，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论语注疏长编》，刘恭冕的《何休注训论语述》，成孺的《论语论仁释》等，可谓是蔚然大观。而“在同是重视汉学的前提下，扬州学者对《十三经注疏》的研究，应是吴、皖两派学者所不及”，“除焦循手批《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勘和刻印《十三经注疏》外，刘文淇祖孙三代是对《十三经注疏》中的注和疏下最多功夫的学者”，“应可认为扬州学派的一种学术特色”（林庆彰《刘文淇〈左传旧疏考证〉研究》）。

与经学相关联的是文字学、音韵学的成就。如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经传释词》都是不朽之作。阮元《经义述闻序》云：“昔余初入京师，尝问字于怀祖先生，先生颇有所授。既而伯申及余门，余平日说经之意，与王氏乔梓投合无间。是编之出，学者当晓然于古书之本义，庶不致为成见旧习所胶固矣。”《经传释词序》云：“高邮王氏乔梓贯通经训，兼及词气，昔聆其终风诸说，每为解颐，乃劝伯申勒成一书。今二十年，伯申侍郎始刻成《释词》十卷，元读之，恨不能起毛、孔、郑诸儒而共证此快论也。”方东树是讥弹汉学家的，但论及《经义述闻》心悦诚服，认为“汉唐以来，未有其比”。

在史学方面，他们精心考史，著述甚多。但着眼点还是放在考证记载的同异，校勘版本的是非，辑补遗佚，注释音义。有专治一史一科的，也有研究诸书的。如任大椿的《吴越备史注》，汪中的《春秋列国官名异同考》、《宋世系表》，刘文淇的《楚汉诸侯疆域志》等。又如凌廷堪“无史不习，大事本末，名匠行业，谈论时若瓶泻水，纤悉不误。地理沿革，官制变置，《元史》姓氏，有诘之者，从容应答，如数家珍”（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凌廷堪》）。他虽无史学著作行世，但文集中论史诸篇，借史事、史书讨论史法、史统，尤其是他正视中国多民族国家这一现实，敢于冲破“夷夏之辨”的束缚，是独具胆识的。扬州学派在史学方面最值得称道的是对方志学的贡献。乾嘉道时期，扬州学派的一些著名人物，如王念孙、汪中、刘台拱、朱彬、江藩、焦循、阮元、王引之、刘文淇、刘宝楠，直至刘师培，差不多都直接从事过地方志书的编修。如阮元主修道光《云南通志稿》，特别是道光《重修广东通志》，以采录广博，体例渊雅，考核精详，素为世人称誉，其价值亦为学界所公认。对扬州地方志他们更为热心，如王念孙受聘修纂乾隆《高邮州志》；江藩与焦循受聘重修嘉庆《扬州府志》，成为清代名志；刘文淇、毓崧父子重修道光《仪征县志》，《续四库全书提要》称“近代邑乘之完美精善者，莫此若矣”；刘寿曾纂修光绪《江都县续志》，亦为后人称允。还有汪中私撰的编年体的地方通史《广陵通典》，焦循搜集整理撰成的《邗记》以及乡里区域志书《北湖小志》，对后人影响很大，对研究地方史价值很高。刘宝楠历14年之久撰成《宝应图经》，考证邗沟水道“十三变”的历史过程，在今天仍不乏其意义。扬州学派在实践中还就方志理论进行研究探讨，对方志的起源、性质、功用，编志的宗旨、原则、结构以及赓续前志、整理旧志等问题都有理论建树。

在文学艺术方面，他们的成就也是引人注目的。扬州是文学学的发源地，扬州学派十分重视学习和研究《文选》。焦循说：“扬州文学，如曹、李之于《文选》，二徐之于《说文》，此二书为万古之精华，而扬州泄之；为天下学者之性命，而广陵兼之。”阮元更把《文选》推举到文的经典的地位。他在《文言说》中提出孔子于《易》著《文言》，阐说《乾》、《坤》，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在《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云：“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必沉思翰藻，始名之为文，始以入选也。”在这一理论指导和创作实践推动下，形成了一个以汪中、阮元、焦循、凌廷堪为代表作家，以《文选》为行文标准，以骈文为主要创作形式，与桐城派古文相对垒的“文选派”。特别是汪中的《哀盐船文》、《广陵对》、《黄鹤楼铭》等杰作传诵一时，洛阳纸贵。章太炎评价说：“今人为俚语者，以汪容甫为善。彼其修辞安雅，则异于唐；持论精审，则异于汉；起止自在，无首尾呼应之式，则异于宋以后之制科策论。而气息调利，意度冲远，又无迫窄蹇吃之病。斯信美也。”（《蓟汉微言》）阮元对诗歌创作，反对摹拟，主张抒写性灵，因而有人评论其诗作“熔铸韩、杜、李、苏”，“包涵万象，元气淋漓，不沾沾于唐宋界限”，“独步当时者也”。焦循不仅精于经学、文学、史学，而且精于戏曲，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文艺发展观，著有《花部农谭》、《剧说》、《曲考》等戏曲论著；还作有《续邯郸梦》传奇。乾隆四十四年至四十七年（1779~1782）间，两淮巡盐御史伊龄阿并图明阿两任，奉旨在扬设局审订戏曲，黄文旸为总校，凌廷堪亦与其事。凌廷堪诗词、文章、学问兼工，卢文弨点评为“诗不落宋元以后，文则在魏晋之间，可以挽近时滑易之弊”（卢文弨《校礼堂初稿序》）。他还著有《燕乐考原》，以论述琵琶调为主，结合当时俗